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



SHIZHUAN YU ZHONGGUO WENXUE XUSHI CHUANTONG

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 倪爱珍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江西省社会科学院学术文库

SHIZHUAN YU ZHONGGUO WENXUE XUSHI CHUANTONG

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 / 倪爱珍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5. 10

ISBN 978-7-5161-7223-0

I. ①史… II. ①倪… III. ①史传文学—文学研究—中国

IV. ①I20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3870 号

出 版 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冯春风
责任校对 张爱华
责任印制 张雪娇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84083685
门 市 部 010-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 刷 北京君升印刷有限公司
装 订 廊坊市广阳区广增装订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1000 1/16
印 张 14.5
插 页 2
字 数 236 千字
定 价 56.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序

傅修延

倪爱珍的《史传与中国文学叙事传统》问世，是一件值得庆贺的事情。这些年来我一直在思考与中国叙事传统相关的问题，指导的博士生也自然而然地跟着我进入了这一领域，他们的工作不但延伸和深化了这方面的研究，还常常反过来给我启发和激励，这就是带学生的好处与乐趣。所谓教学相长，主要来源于师生之间的这种思想激荡。倪爱珍毕业后花了不少时间与精力，对自己的博士学位论文进行了充实完善，最终形成读者所见到的这部学术著作。学术著作的出版是一个人学术道路上的重要里程碑，我为她收获的第一枚有分量的学术果实感到由衷的欣喜。

史传是中国叙事文学的源头，在我们这个“史贵于文”观念长期流行的文明古国，研究叙事传统不可能不首先注意史传。本书选择的这一方向虽有不少人拓垦在先，但作者仍能找到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空白，另辟蹊径提出自己的创见。作者认为文史共处的母体生产了文学叙事的可能性与规则，它们在后世的文学叙事中打下了根深蒂固的烙印，后来的叙事形式和功能虽然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但却割不断与史传的血脉联系。书中对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发展脉络做出了较为细致的梳理与勾勒，所讨论的一些问题，如虚构与真实、预叙与应验以及“春秋笔法”等，在古代文学领域虽然是司空见惯，但由于引入了当代叙事学的一些范畴与概念，从理论高度进行烛照和分析，因而读来仍不乏新意。作者的文笔素来流畅，她对域外理论的援引不是时下常见的简单搬运，而是有较强针对性的自如化用，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普林斯顿大学的汉学教授浦安迪（有《中国叙事学》等著作）当初在主持作者的博士学位论文答辩时，便和其他答辩委员一样对她的这种努力给予了认可。

当然，本书也不可能一举解决与中国叙事传统有关的所有问题。史传之所以会对文学叙事产生影响，归根结底要到古人的观念意识中去寻求答案。罗兰·巴特在《文之悦》中说“写”本是“一体无分”的，小说家的“写”与其他人的“写”都是“文的编织”，这样的认识在我们古人那里其实早有产生，他们对虚构与非虚构的区别并不执着就是明证。先秦之后文史虽然分道扬镳，但在主流意识形态中，《春秋》和“春秋笔法”仍然是衡量一切叙事的标准：将某部小说比之为《春秋》，乃是对其叙事水平的最大赞誉；说某位作者深谙“春秋笔法”，亦为对其叙事能力的高度肯定。戚蓼生《〈石头记〉序》称《红楼梦》“如《春秋》之有微词，史家之多曲笔”，就是此类评论的典型。《史记》与《汉书》横空出世之后，“史迁”、“班马”之类又成了叙事高手的代名词，古人所说的“史才”、“史笔”并非专指修史才能，而“六经皆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理解为“六经”之中皆有叙事——不管是什么样的叙事。20世纪美国的文学理论家雷·韦勒克和奥·沃伦曾经指出叙事的“跨文类”性质，西方叙事学近期呈现出来的“跨学科趋势”印证了这一先见之明，但我觉得我们的古人早就察觉到讲故事行为不受任何文类约束。因此只有开展“知识考古”般的四处寻访与刨根问底，从人类学、宗教学、神话学、语言学、符号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等相关领域广泛征求材料，才有可能最终探明和缕清中国文学叙事的谱系，为中国叙事传统的发生与形成提供更为合理的解释。

如此看来，本书的出版对作者来说意味着既有研究告一段落，更具挑战性的学术攀登还在前头。庄子《逍遥游》说“适百里者，宿舂粮；适千里者，三月聚粮”，为了给自己新的攀登准备理论粮草，作者目前正在四川大学赵毅衡教授旗下接受博士后训练，这一抉择体现了她“三月聚粮”的决心与勇气——赵毅衡教授是真正当得起“学贯中西”四字的学者，在符号学大本营里的深造将给作者带来脱胎换骨般的变化，使其具备“适千里”的长途跋涉能力。从我与作者的多年接触中，我感到她身上最不缺乏的便是敢于面对挑战的决心与勇气——2009年她向我表示要报考叙事学博士生时，脸上流露的就是这样一种义无反顾的表情，当时我担心她的现当代文学基础可能难于适应叙事学专业的理论要求，但她最终以刻苦的学习消除了我的担心。

《优婆塞戒经》讲述了一个“三兽渡河”的故事：“兔不至底，浮水而过；马或至底，或不至底；象则尽底。”假如说把做学问看成是渡河，那么当前许多人追求的是像兔子那样“浮水而过”，他们进入学术领域为的是获取学位、职称或其他好处；还有一些人是像马儿一样半浮半沉地渡河，其学术脚步并不是每一下都触到实处；只有少数人能像大象那样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到对岸，凡成大事業者必定都取这种脚踏实地的跋涉方式。《光明日报》最近以《独骑瘦马取长途》为标题报道了扬州大学的车锡伦教授，这位年近八旬的退休教师一直默默无闻地为自己的宝卷研究做着辛苦的田野调查，直到最近其成果获得教育部优秀成果一等奖等奖励之后，学界才有更多人理解其工作的意义。我自己这辈子的学业最多是深一脚浅一脚的“马渡”，但我希望倪爱珍和有志于学的青年才俊都能像车锡伦先生那样，坚持用“象渡”方式走向自己的学术目标，这就是“三兽渡河”故事给我们的启示。

是为序。

2015年6月1日

目 录

序	(1)
绪论	(1)
第一章 史传纪实型叙事特征及对文学的影响	(12)
第一节 史传与中国纪实型文学叙事的优先发展	(14)
第二节 史传与文学叙事重事实轻虚构的倾向	(34)
第三节 实录：从史传叙事原则到文学叙事修辞	(38)
第二章 史传中虚构叙事的发生及对文学的影响	(47)
第一节 事件：核心事件之实与卫星事件之虚	(53)
第二节 言语：拟言、代言及其形态和功能	(60)
第三章 史传中的神奇事件及在文学中的流变	(70)
第一节 成因：史出于巫的文化传统	(70)
第二节 成因：口传史料的大量渗入	(80)
第三节 流变：从史之奇到文之奇	(86)
第四章 “春秋笔法”的叙事机制及内涵的变迁	(92)
第一节 “春秋笔法”与“不可叙述事件”	(92)
第二节 从“春秋笔法”到“隐含的叙述”	(101)
第五章 史传叙事策略及在文学中的承衍	(109)
第一节 叙事视角及其承衍	(109)
第二节 叙事结构及其承衍	(119)
第三节 叙事干预及其承衍	(131)
第四节 预叙：从预占记录到叙事策略	(138)
第六章 史传的人物塑造及对文学的影响	(150)
第一节 异人异相的人物表征	(150)

第二节	“行动 > 性格”与人物生成	(157)
第三节	从历史人物到文学人物	
	——《左传》与《晏子春秋》中的晏子形象比较	(165)
第七章	杂史——从史传叙事到文学叙事的过渡	(175)
第一节	《战国策》中虚构叙事的发生及范式	(175)
第二节	《吴越春秋》叙事的历史剥离之势	(193)
结论		(212)
参考文献		(216)
后记		(223)

绪 论

叙事学，毫无疑问是当今文学理论中一个不可缺少的关键词。它于20世纪60年代在法国正式诞生，80年代中期陆续传入中国。学者们在学习研究西方叙事理论的同时，也开始了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用傅修延在《先秦叙事研究·绪论》中的话说，这是一次“补课”。因为中国文论的主体从来都是诗论。明清之际，伴随着小说创作的繁荣，出现了金圣叹、毛宗岗、张竹坡等人的小说评点。但这种随感而发的评点肯定不足以与几千年形成的系统的诗论相抗衡。其后，由于政治、战争等因素的影响，对中国叙事文学做理论总结的课题一直没有被提上议事日程。20世纪80年代末，在西方叙事理论的激励与启示下，一批学者展开了对中国叙事传统的研究，其中就包括对《左传》《史记》等史传文本的研究。毫无疑问，这门新的理论为漫长的史传研究旅程带来了新的风景。但同样毫无疑问的是，中西方叙事有着不同的传统、发展路径，用西方理论研究中国文本必然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障碍。从中国的叙事文本出发，建构符合中国叙事实践的理论话语势在必行。史传是最具中国特色的叙事文本，深刻地影响了国人的叙事思维，深远地影响了后世的文学叙事，所以本文把它称作一种“叙事范型”应不为过。那么，对这种叙事范型的内涵进行全面地研究，概括、提升、总结出系统的史传叙事理论，并进一步深入地研究它对中国后世叙事文学（主要是古典叙事文学）的影响，以此来管窥中国的叙事传统，建构真正属于中国本土的叙事理论话语，丰富和完善当今的叙事学，则是本文的目的。

本文中的“史传”主要取义于南朝梁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传》。此文在解释左丘明作《左传》时说：“然睿旨存亡幽隐，经文婉约；丘明同时，实得微言，乃原始要终，创为传体。传者，转也，转受经旨，以授于

后，实圣文之羽翮，记籍之冠冕。”也就是说，《左传》乃传体之作，是解经的——“实圣文之羽翮”，也是载史的——“记籍之冠冕”。刘勰在《史传》篇中，除论述《左传》这部解经之作外，还论述了《战国策》《楚汉春秋》《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等众多非解经之作。可见，他对“史传”的界定，实指上起唐虞、下至东晋的各种史书。因为本文是从源头上研究史传叙事对文学叙事的影响，所以涉及的史传文本偏于先秦两汉时期的，以《史记》为界。因为《史记》无疑是文学性最高的史传作品了，其后的《汉书》《三国志》的文学性呈逐渐降低趋势。这是因为此时文与史开始分道扬镳。唐刘知几在《史通·核才》中说：“昔尼父有言：‘文胜质则史。’盖史者当时之文也。然朴散淳销，时移世异，文之与史，较然异辙。故以张衡之文，而不闲于史；以陈寿之史，而不习与文。”刘知几认为文史分家在陈寿的《三国志》中表现很明显。但其实早在班固的《汉书》中就已经有这种趋势了。总体来说，《汉书》体例严谨有余，而描写生动不足。

本文中的“文学叙事”是个特定的概念。受史传叙事影响最直接的、最大的是中国古代的叙事文学作品，尤其是小说。但“小说”这个概念本身比较复杂。古代目录学中的小说概念和现代意义上的小说概念差异很大。本文中的小说概念指后者，具体的指称对象主要参考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变迁》。由于《汉书·艺文志》中所录小说均已散佚，今所见汉人小说又几乎全是后人伪托之作^①，所以六朝志怪、志人常常被认为是最早的小说。本文中的“文学叙事”中的“文学”主要指六朝志怪志人小说、唐传奇、宋话本、明清白话小说，也涉及笔记小说、传记文学等其他叙事文类。

关于史传的叙事研究，自古至今已出现很多成果。它们成为本文研究的起点和基础。由于《左传》和《史记》是史传发展的两座高峰，所以所谓的史传叙事研究主要就集中在这两部书的叙事研究上。

关于《左传》的研究，唐朝以前，更多的是从经学、史学角度进行，

^① 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说：“现存之所谓汉人小说，盖无一真出于汉人，晋以来，文人方士，皆有伪作，至宋明尚不绝。文人好逞狡狴，或欲夸示异书，方士则意在自神其教，故往往托古籍以衒人；晋以后人之托汉，亦犹汉人之依托黄帝伊尹矣。”《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也认为《汉武洞冥记》《拾遗记》等均可能为六朝人的伪托之作。

对其文学性的关注较少。韩愈虽然看到了《左传》叙事不同于历史叙事，但却以“左氏浮夸”而言之，没有注意到“浮夸”对孕育文学叙事的重要性。相比之下，刘知几虽为史学家，却在《史通·杂说上》中对《左传》的文学叙事进行了精彩的描述：“《左氏》之叙事也，述行师则簿领盈视，咙聒沸腾；论备火，则区分在目，修饰峻整；言胜捷，则收获都尽；记奔败，则披靡横前；申盟誓则慷慨有余；称谲诈则欺诬可见；谈恩惠则煦如春日；纪严切则凜若秋霜；叙兴邦则滋味无量；陈亡国则凄凉可悯。或腴辞润简牍，或美句入咏歌，跌宕而不群，纵横而自得。若斯才者，殆将工侔造化，思涉鬼神，著述罕闻，古今卓绝”。此段评论涉及《左传》的谋篇布局、事件讲述、气氛渲染、情感抒发等。刘知几推崇《左传》为“述者之冠冕”，对其叙事艺术极为欣赏，赞其言事相兼，烦省合理，情节连贯曲折，场面描写逼真，人物形象鲜明，语言简洁而内蕴丰厚，远远高出其他“二传”。

自宋代开始，《左传》研究出现舍传求经的倾向，元明时期更进一步走向政治化。宋真德秀的《文章正宗》中，将文章分为辞命、议论、叙事、诗赋四类。这实际上标志着宋人一种新的文章观念，是对此前《文章流别论》《文选》不从子史中摘选文章惯例的一个突破。他从《左传》中摘选文章并对其叙事文法加以评点。这种从文学角度对《左传》的评点至清代时大盛，其中一个重要内容就是对叙事文法的总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篇法。代表者如冯李骅《左绣》的“整齐论”和王源的“错综论”。前者认为《左传》行文最大的特色是散中有整，以整驭散。当时以整齐法论《左传》的还有方苞、李文渊。方苞在《左传义法举要》中称：“叙事之文，最苦散漫无检局，惟左氏于通篇大意贯穿外，微事亦两两相对。”李文渊在《左传评》中也强调左氏为文“两两相对”“往往以对待出之”，于散行中求整齐。这与明末清初“以古文为时文”的社会风气有关。王源论文好错综，谓“必错综而后可以言文，未有印板整齐而谓之文章者”，并指出了《左传》的多种错综之法，如多头绪、化整为散、变偶为奇、以整齐为错综等。第二，章法。评点中关于《左传》章法的论述包括伏应、过渡、宾主、详略、虚实等，其中尤以冯李骅的评点为甚。他在《左绣》把左氏埋伏之法分为八种：倒伏、顺伏；明伏、暗伏；正伏、反伏；因文伏事、因事伏文。第三，叙法。关于

《左传》的叙事手法，冯李骅总结为：“其中有正叙，有原叙；有顺叙，有倒叙；有实叙，有虚叙；有明叙，有暗叙；有预叙，有补叙；有类叙，有串叙；有摊叙，有簇叙；有对叙，有错叙；有插叙，有带叙；有搭叙，有陪叙；有零叙，有复叙；有间议夹叙，有连经驾叙，有述言代叙，有趁文滚叙，有凌空提叙，有断案结叙。”由上可见，他的分类是按不同标准进行的，而且没有作进一步的详细论述。王源则结合文本对其中的顺序、倒叙、追叙作了更明确的界定。吴闿生对《左传》的“逆摄”“横接”“旁溢”“反射”等叙事法进行了探讨。

除评点外，文论、史论中也有很多涉及《左传》文学叙事的研究。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把《左传》所使用的叙事方式归纳为二十余种：“盖其为法，则有以顺叙者，以逆叙者，以类叙者，以次叙者，以牵连而叙者，断续叙者，错综叙者，假议论以叙，夹议论以叙者，先叙后断，先断后叙，且叙且断，以叙作断，预提于前，补缀于后，两事合一，一事分两，对叙插叙，明叙暗叙，颠倒叙，回环叙。”刘熙载在《艺概》中说：“左氏叙事，纷者整之，孤者辅之，板者活之，直者婉之，俗者雅之，枯者腴之，剪裁运化之方，斯为大备”，这是对《左传》情节编排艺术的精练总结。

关于《史记》叙事的特点，早在西汉的扬雄就有所论述，他在《法言·重黎篇》中说：“或问周官，曰：立事；左氏，曰：品藻；太史迁，曰：实录”，在《法言·君子篇》中说：“子长多爱，爱奇也。”“实录”“爱奇”两说对后世影响很大，前者揭示了《史记》作为历史叙事的根本特点，后者揭示了《史记》中文学性叙事产生的深层动机。东汉班固对《史记》的“实录”又进行了详细的解释，即“善叙事理，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故谓之实录”。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司马迁撰史“实录无隐”、秉笔直书，肯定了其开创纪传体之功，但对其“爱奇反经”表示微词。不过，他同时又深刻地揭示了史传中出现虚构因子的必然性及其原因，即“然俗皆爱奇，莫顾实理。传闻而欲伟其事，录远而欲详其迹，于是弃同即异，穿凿傍说，旧史所无，我书则传，此讹滥之本源，而述远之巨蠹也。”

《史记》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的地位是在唐宋时期奠定的。唐宋科举考试的内容之一即是“三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以司马

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史记正义》为代表的《史记》注释的问世，对《史记》的传播发挥了巨大作用。唐代中后期，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对《史记》的文学批评开始走向独立，专门论《史记》的文章、笔记数量大增。这些文章除进一步对《史记》的叙事体例进行肯定外，还对《史记》的叙事风格、写作技法进行了初步的总结。韩愈赞其“雄深雅健”，柳宗元称其“甚峻洁”，这些都成为后世评价《史记》风格的核心词。洪迈在《容斋随笔》中指出司马迁善于运用“重沓熟复”使文章有“如骏马下驻千丈坡”的气势和力量。刘将孙在《萧达可文序》中指出《史记》善于以小见大的叙事特点，“太史公之鼓舞变化，类常事小节，他人以为不足传者”。苏洵在《嘉祐集》中总结出的《史记》叙事的一个特点——“本传晦之，而他传发之”，也即“互见法”，为人们的研究提供了新的思路。此外，唐代的一部影响深远的史学理论著作——刘知几的《史通》中有专门一章“叙事”，在充分肯定《史记》叙事的优点后，对司马迁将一些凭空虚构之事编入史书进行了严厉的批判，“自战国以下，词人属文，皆伪立客主，假相酬答。至于屈原离骚辞，称遇渔父于江渚；宋玉高唐赋，云梦神女于阳台。夫言病文章，句结音韵。以兹叙事，足验凭虚。而司马迁习凿齿之徒，皆采为逸事，编诸史籍，贻误后学，不其甚邪！”

明清两代掀起的评点高潮，使先秦两汉的史传备受关注，其中《史记》的评点率最高。明代《史记》评点家有80多位，清代有300多位，其评点中跟叙事有关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叙事章法。评点家普遍认为《史记》叙事章法谨严，脉络清晰。明茅坤说：“读前段，便可识后段结按处，读后段，便可识前段起按处。于中欲损益一句一字处，便如于匹练中抽一缕，自难下手。”清惠栋说：“《史记》长篇之妙，千百言如一句，由其线索在手，举重若轻也。识得此法，便目无全牛。”二是叙事手法。评点家认为《史记》的叙事手法变化多端，不拘一格。明王维桢说：“迁史之文，或由本以之末，或操末以续颠，或繁条而约言，或一传而数事，或从中变，或自旁出，意到笔随，思余语止，若此类不可毛举，竟不得其要领。”明冯班说：“《史记》叙事，如水之傅器，方圆深浅，皆自然相应。”清汤谐认为“《史记》之文，一篇自有一法，或一篇兼具数法。”清刘熙载说：“《史记》叙事，文外无穷，虽一溪一壑，皆与

长江大河相若。”

总体来说，古代关于史传叙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评点、文论、史论中。它们更多的是文体论，就文论文，对叙事文的谋篇布局、锻句炼字等进行细致分析，目的是通过对史传文法的总结，揭示叙事类古文的创作规律。他们的观点有很多精彩之处，但由于受中国传统文论思维、体例的影响，多用形象化、概括性的语言进行片言只语式的论述，缺乏全面、细致、系统的研究。

近现代关于史传叙事的研究更多了，特别是80年代末西方叙事学进入中国后。学者们做出了很多对本文研究具有启发性的研究成果，主要有：

第一，关于史传中的虚构问题。章太炎先生在《国史讲演录》中认为《史记》“列传中琐屑之事，则不可尽信……记载人物，往往奇传非常……曾涤笙谓《庄子》多寓言，《史记》所载，恐亦太史公之寓言”。钱锺书在《管锥编》中以《左传》为例提出了“史有诗心、文心之证”的卓越见解。美籍学者王靖宇的《中国早期叙事文研究》运用西方经典叙事学理论框架对《左传》《国语》《史记》等早期叙事文进行探讨，认为这些文本中包含着虚构成分，是因为历史家在编造情节时往往和小说家一样，所考虑的是叙事的合理性和完整性。傅修延的《先秦叙事研究》以“虚毛实骨”精练地概括了《左传》中事实与虚构相互交融的状态。

第二，关于史传的叙事策略问题。叙事时间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史传中的顺叙、倒叙与预叙的特征及文化内涵上，虽然每个学者所用概念有异，但基本观点大致相同的，以丁琴海的《中国史传叙事研究》最为详细。该书对史传尤其是《左传》的时间标示、顺时叙述、倒叙的技巧和功能、预叙的文化内涵、连贯叙述风格的文本因素等进行了细致深入的分析。在众多研究中，《左传》的预叙成为研究的焦点。学者们对其进行种种分类，如以语言、行动来预叙的实写性预叙和以梦、占卜、异象来预叙的虚写性预叙，直觉的经验预言和技术的知识的预言，人事预叙和占卜预叙，为占卜、星象等的“神秘预叙”和通过人物性格暗示其命运的“理性预叙”等。关于预叙的功能，学者们有安排情节结构、制造悬念、政治伦理的训诫诱导、预设人物性格、暗示人物命运等观点。关于史传叙事视角研究也很多。石昌渝的《中国小说源流论》对史传的第三人称客观

叙述特征及其对后世文学叙事的影响论述得比较翔实,其观点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他总结这种叙述的特点是全知视角和客观叙述,认为“春秋笔法”即是典型的客观叙述,并对杜预所总结的“春秋笔法”五种类型进行了详解。丁琴海在《中国史传叙事研究》一书中对《左传》的史家式全知叙述的内容特征、形式特征及功能也进行了详细研究。关于叙述者干预的研究,主要表现在“君子曰”和“太史公曰”上。从文学角度的研究集中在它的思想内容、结构方式、语体风格及其对后世小说的影响上。

第三,关于史传的情节编排问题。童庆炳的论文《中国叙事文学的起点与开篇——〈左传〉叙事艺术论略》认为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强调“故事情节化”,最早就是从《左传》开始的。《左传》通过揭示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把史实情节化。《左传》叙事按自然时间演进的占了绝大多数,这主要是受中国古代农业文明的守时、顺时观念的影响。《左传》标示时间按照年、季、月、日的顺序进行,这是中国文化的“以大观小”法在起作用。台湾学者张高评的著作《左传之文学价值》从中国传统文章义法的角度,将《左传》的情节编排方法分为正叙法、原序法、逆序法、对叙法、类叙法等四十余种。韩国学者朴宰雨《〈史记〉〈汉书〉比较研究》总结《史记》的情节安排技巧有“上升法”“对称法”“对比法”“插叙法”“减轻法”“悬疑法”等。

第四,关于史传的叙事体例、结构问题。董乃斌在《中国古典小说的文体独立》中认为《史记》为小说文体的孕育所作的一大贡献就是“这部书从头到尾贯串了以人物及其命运为核心的叙事线索”。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认为《左传》《史记》的“编年体和纪传体的结构方式为后世长篇小说的结构类型的形成奠定了基础”。郭丹在专著《史传文学:文与史交融的时代画卷》中论述了《史传》“以人中心”的叙事体例、文学化的叙事模式、结构之美等问题。此外,对《史记》“互见法”的探讨也比较多。关于它的源头问题,有的追溯到《吕氏春秋》,有的追溯到《左传》《国语》,有的认为是受了庄子的影响等;关于它的作用价值问题,有的认为其具有省略、虚实、详略、互补、存疑等多种艺术功能,有的认为它使人物在本传中道德和精神变得明确单一,便于史官评判人物等。

第五,关于史传中的人物问题,学者们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人物典型、人物形象系列、人物描写方式、人物审美价值、人物文化内涵等,主要是依托传统文论中的人物理论来进行研究,也有少数几篇文章从符号学、人类学、社会学、地理学等角度去研究。孙绿怡在《〈左传〉与中国古典小说》中将《左传》中的人物分为两种类型:闪现型和累积形。前者指仅写一件事就勾勒出某一人物的形象或表现其某一方面的性格要素,后者指由分年记事逐渐展示某一人物的性格,构成完整的形象。这个研究角度比较独特,影响也很大。

除上述的《左传》和《史记》外,先秦其他史传的叙事研究较少。傅修延在《先秦叙事研究》中首次从叙事的角度对甲骨卜辞和青铜铭文进行研究,指出卜辞带来了一种简练经济的叙事风格,开启了一种从问答导入正文的叙事程式,成为中国叙事史上一种源远流长的传统。青铜铭文中虚构性因素隐约出现,文学性叙事开始萌芽。他认为《尚书》论事具有直陈、动情、用威、烦琐四个语体特征,并且频繁使用比喻修辞。此外,还有几篇论文研究《国语》《战国策》叙事。

上述研究成果为本文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也留下了一些尚需进一步探索的空间,主要有:第一,很多关于史传的叙事研究虽冠以“叙事”之名,在研究中也借用了叙事学的一些概念术语,但真正属于叙事学研究的并不多。叙事学总体来说属于形式研究,比如表达的形式(如叙述者、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等)、内容的形式(叙事语法、叙事逻辑等)以及形式对意义生成的影响等。新叙事学虽已扩展至修辞叙事、认知叙事、语境叙事的研究,但仍然是从形式出发来研究这些问题。第二,总体来说,已有的成果多是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去研究史传文本,所以主要是对文本内容的分析,而且分析多停留于叙事策略上,特别是叙事时间、叙事视角、叙事结构这几个方面。他们所运用的理论主要是经典叙事学,理论资源和研究角度比较单一,即使是叙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后经典叙事学的理论成果都没有吸收进来,更遑论其他理论了。第三,史传是独具中国特色的一种叙事范型,但目前尚缺乏从理论的高度对其内涵进行概括、提升,以总结出系统的史传叙事理论。关于其在后世文学中的传承和演变,也即它对后世文学的影响,有些学者的研究虽有所涉及,但他们或者是在研究中国古典文学时把史传作为其中一个源头进行研

究,或者是研究某个史传文本时指出其对后世文学叙事的影响,不够全面和系统。

鉴于此,本书想在这方面做一些尝试,具体思路为:

中国叙事文学与西方叙事文学有着不同的源头。西方叙事文学的开山鼻祖是史诗^①,而史诗在本质上属于虚构叙事。在它影响下形成的西方叙事,从一开始就明确地表现了肯定虚构的传统。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认为:“悲剧是对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摹仿。”^②悲剧是模仿现实而不是实录现实。雷·韦勒克认为小说“是史诗和戏剧这两种伟大文学形式的共同的后裔”,“想象性的文学就是‘小说’(fiction),也就是谎言。‘fiction’这一词的词义中仍然残留有古代柏拉图派对文学的控诉”。^③英文“fiction”本身就含有虚构、杜撰之义。

中国叙事文学的重要源头是史传,而史传属于纪实叙事。小说是叙事文学的代表。中国小说的源头一般认为有三个,即神话、子书和史书。杨义对此作了一个形象的比喻,“神话和子书是小说得以发生的车之两轮,史书则是驾着这部车子奔跑的骏马”。^④中国的神话具有“非叙述、重本体、善图案”^⑤的特点,不同于希腊神话的“叙述性”,在思维方式上,前者呈现空间化特征,后者则为时间化。其后,由于多种原因导致了神话历史化,这使本就不成体系的神话更加破碎化、零散化。所以,它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影响偏重于叙事思维和叙事题材上。^⑥子书的叙事性不强,寓言算是叙事成分较多的了。但因为其叙事是为了说理,所以短小凝练,艺术性不高,其影响偏重于虚构思维的培育上。以实录为原则的史书对文学

① 这是因为史诗是至今可以见到的最早的叙事文本。神话虽比史诗产生早,是各国叙事文学共同的源头。但由于神话是口传,没有文字文本,所以现今只能从史诗、悲剧中见到它零散的身影。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陈中梅译注,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63页。

③ [美]雷·韦勒克、奥斯汀·沃伦:《文学理论》,刘向愚等译,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年版,第236—237页。

④ 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6页。

⑤ [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43页。

⑥ 石昌渝在《中国小说源流论》中认为影响表现在题材和精神上,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认为表现在民间信仰和趣味、题材形态上。傅修延在《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中认为《山海经》对后世叙事文学的影响表现在故事胚胎、神话思维上。